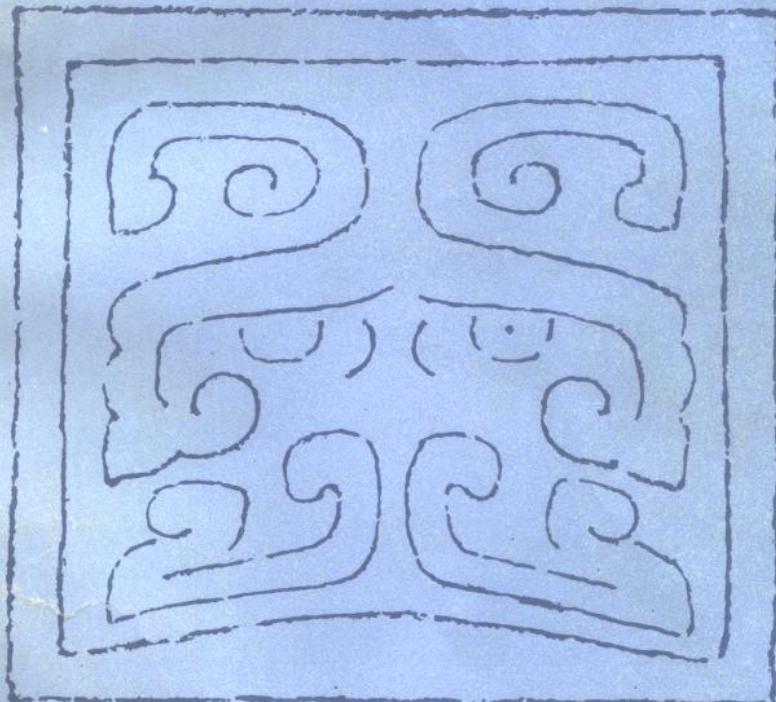


# 李白十论

裴斐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207.209/9

裴斐著

# 李白十论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20848449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848449

责任编辑：戴安常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**李白十论**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裴斐著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5.75 插页4字数122千

1981年11月第一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,800册

---

书号：10118·485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定价：0.64元

## 题记

论文十篇，大率皆肤泛之作，或不失一得之功，因以成集，冀就教于同好也。

集末一篇系五十年代旧作，当初在《文学遗产》发表时，该刊主编陈翔鹤先生以题目过长，由他做主改为《谈李白的诗歌》（载1955年该刊79、80两期），今复原题，文字一仍其旧，以存历史本来面目。此外各篇均近年新作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裴斐时寄寓北大蔚秀园

## 目 录

### 题 记

Dec 1986

历代李白评价述评	1
李白经济生活探源	28
李白供奉翰林小议	35
论李白的隐逸	48
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	69
从李白饮酒诗看诗人性格及其思想矛盾	103
李白山水诗中的情与景	111
论李白的游仙诗	122
李白诗歌中的另一个领域	137
论李白诗歌中的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的主题	154

## 历代李白评价述评

中国文学史上二人齐名的现象 颇 常 见， ——如屈宋、扬马、嵇阮、沈宋、王孟、元白等等，不胜枚举， ——无不是由于风格相近或属同一流派。惟独李白和杜甫，风格截然不同，却连得比谁都紧；历代论家评李必及杜，评杜必及李，几无例外。

李杜齐名在历史上起于何时？《旧唐书》载：“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”，不足信，那是刘昫上了元稹的当（他判李白为山东人亦由元稹传讹）。李白在世时已经名扬宇宙，以匹夫而动九重，诗名之盛远非杜甫所可比拟，李阳冰评李白：“千载独步，惟公一人”<sup>(1)</sup>，未及杜甫；殷璠于天宝末选《河岳英灵集》未收杜诗，也是个证明。直到中唐，苦吟派诗人孟郊还说：“天宝太白歿，六义已消歇”<sup>(2)</sup>，也还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。过了不久，随着社会情况和文学潮流的变化，到了比孟郊年轻的白派诗人眼里，情况才发生变化。杜甫诗名显赫，肇自白派诗人的揄扬，一下子便凌驾李白之上。李杜齐名实际上是由抑李扬杜开始。

宋人每以元稹为抑李扬杜老祖宗，原因是他那篇《杜君墓系铭序》被五代人刘昫写进了堂堂正史。其实元稹背后还站着

个更大的人物，便是白居易。白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：“李之作才矣奇矣，人不逮矣。索其风雅比兴，十无一焉！杜诗最多，可传者千首；至于贯穿古今，覩缕格律，尽丁尽善，又过于李。”所谓“风雅”指诗歌内容，“覩缕格律”指诗歌形式；白居易认为两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。元稹抑李扬杜侧重形式，认为李白乐府歌行尚可差肩于杜甫；至于在“铺陈终始、排比声律”、“属对律切、脱弃凡近”方面，李连杜的藩篱也够不着，不用说登堂入室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在上述《书》和《序》中对屈原也不无贬抑，白居易说：“河畔之吟归于怨思”、“得风人之什二三”，元稹也说：“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”；所谓“怨思”、“怨愤”都是贬辞。白派诗人一向把《诗经》当作自己的典范和衡量历代作品的楷模，而他们对《诗经》的理解则全由汉儒影响，如“干预教化”（元《序》）、“补察时政、导泄人情”（自《书》）之类——毫无创新。（当然，他们对《诗经》的这种迂腐理解同他们从《诗经》受到的实际影响并不相符）。他们从形式方面抑李扬杜也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。首先，被他们奉为圭臬的《诗经》——主要是《风》和《雅》——本身便是古代乐府诗，从形式上看，倒是擅长乐府歌行的李白离它近些，善于“覩缕格律”的杜甫离它远些；另一方面，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律”也并非杜诗精华所在，后世元好问在《论诗》中说：“排比铺张特一途，藩篱如此亦区区；少陵自有连城璧，争奈微之识珷玞”，这个批评颇中肯。再说，元稹所指杜诗特点“属对律切，脱弃凡近”，也并不符合白派诗人自己的主张和诗风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白派诗人的抑骚扬风和抑李扬杜又是很有见识

的。我们现在称之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创作方法，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两种传统的；白派诗人已经感觉到两种传统的存在，并加以区分。虽然他们对《诗经》和杜甫的理解有偏差，但在关心民生疾苦、重视文学真实性和思想性这些重要方面，他们同《诗经》和杜甫的确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。对于自己的祖师和前辈，理所当然地要极力颂扬。至于代表另一传统的屈原和李白，他们在别的场合也颂扬，但用自己的文学标准衡量，终嫌是旁门邪道。我们说元白有见识，指的便是这种门户偏见。

但是，单纯用门户偏见解释历史上的抑李扬杜，也行不通。元白固然是继承了《诗经》和杜甫传统的现实派诗人；可是还有许多别的现实派诗人，在李杜优劣问题上并不采取同样立场。例如晚唐诗人皮日休，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现实派，其文学主张和白居易一脉相承，但他惟不抑李，反而在李杜并重当中流露出明显的偏李。还可以从相反方面举例，如宋代大家苏轼，应当算是浪漫派，其诗词风格深受李诗濡染；然而他却卷入了北宋甚嚣尘上的诋李大合唱。皮日休的偏李和苏轼的诋李，显然都不是出于艺术风格的门户偏见。还有比艺术偏见更起作用的政治偏见。

历史上的抑李扬杜，主要在宋代。王安石编杜、韩、欧、李《四家诗》，将李白置于宋人欧阳修之后，这个奇怪次序引起过种种传说。据载王安石说过这种话：“白诗近俗人，易悦故也；白识见污下，十首九说妇人与酒。”<sup>(3)</sup>或云：“太白词语迅快，无疎脱处；然其识污下，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。”<sup>(4)</sup>寥寥数语，对李白的曲解姑置不论，倒是活现出说者头巾

气十足的卫道家面目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尝疑其依托，非王安石本意。无论说者是谁，这种见解被当时各种诗话文评展转引录，流传颇广，影响甚大；宋人诋李，此其滥觞。同时另一位大家苏轼的意见有点蹊跷，他说：“李太白、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”<sup>(5)</sup>，这是李杜并称；又说：“古今诗人众矣，而杜子美为首”<sup>(6)</sup>，这可是独重杜甫了。他写的《李太白碑阴记》开头便说：“李太白，狂士也！又尝失节于永王璘，此岂济世之人哉！”旋又称李白使力士脱靴“气盖天下矣！”对李白“戏万乘若僚友、视侍列如草芥”大加赞赏。这种矛盾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双重性：既是一个大诗人，又是一个终生从政的老官吏。他的亲密兄弟苏辙讲得更透彻：“李白诗类其人：骏发豪放，华而不实，好事喜名，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！”<sup>(7)</sup>对于李白从璘一节，他哥哥还曲为开脱，说是“当由胁迫”，他干脆说是“从之不疑，遂以放死”，幸灾乐祸，溢于言表；下面接着说：“杜甫有好义之心，李白所不及也。”证据是李白写过“但歌大风云飞扬，安用猛士守四方”，对汉高祖太不尊敬，“其不达理也如此！”可见，所谓义理，不外乎“君为臣纲”之类。南宋大家陆游的观点亦类苏轼。他在《读李杜诗》中对李杜并极推崇，“明窗数编在，长与物华新”；在《示子韦》中亦云：“数仞李杜墙，常恨少领会”。可是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又说“白识度甚浅……汝但以其辞豪俊动人故，不深考耳”，也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李白有所贬抑。在当时许多诗话文评当中，抑李扬杜更成时尚，如北宋论家葛立方便认为：“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，岂白所能望耶！”<sup>(8)</sup>南宋初有个“人品经济炳然史册”的大人物李

纲，则认为杜甫诗“质胜文”，李白诗“文而无质”<sup>(9)</sup>，可谓言简意赅。下面赵次公和罗大经的话，可视作李纲观点的阐明。赵次公曰：“李杜号诗人之雄，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，神仙虚幻之说，亦何补于教化哉！惟杜陵野老，负王佐之才，有意当世。”<sup>(10)</sup>罗大经说亦相类：“李太白当王室多难，海宇横溃之日，作为歌诗，不过豪侠使气，狂醉于花月之间耳！社稷苍生，曾不系其心膂；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，岂可同年语哉！”<sup>(11)</sup>由上可知，宋人抑李扬杜在“质”不在“文”，他们总是极力诋毁李白的人格和作品内容。其实，别的暂且不讲，就说忧国忧民吧，李白于杜甫至少无逊色，他不但有作品，还有行动。可是人家不承认，你的作品是“豪侠使气”、你的行动是“从逆”，“亦何补于教化哉”！以儒为宗的教化，便是他们的政治标准。宋代封建士大夫经常是把政治标准当作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，值得注意。但我们用另一种政治标准衡量，宋人的抑李扬杜恰好是抑杜扬李，这当然是他们始料未及的。

与抑李扬杜一派并行发展的，历史上还有主张李杜并重、不可轩轾一派，其始祖是和白派诗人同时的韩愈。白派诗人的抑李扬杜论刚出笼，便遭到韩愈的迅猛反击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！那知群儿愚，何用故谤伤？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！”前人多以这番话为针对元稹，恐非是。此诗题《调张籍》，又指斥“群儿”，可知针对一群人，即包括元、白、张在内的白派诗人无疑；诸人中唯张籍以诗文与韩愈过从，故韩诗题作《调张籍》。

韩愈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。杜牧说“李杜泛浩浩”、李商

隐说“李杜操持事略齐，三才万象共端倪”<sup>(12)</sup>便都是并重。现实派著名诗人皮日休对李杜也是并极推崇，还似乎有些偏李，曾于《刘枣强碑文》中痛快淋漓地抒发过对李白的景慕，又《七爱诗》中评李云：“惜哉千万年，此俊不可得！”同时另一现实派名家杜荀鹤过李白墓时也曾感叹道：“青天明月夜，千古一人诗！”<sup>(13)</sup>吴融亦云：“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，独李太白为称首盖。”<sup>(14)</sup>要言之：白派诗人的观点于晚唐了无影响，倒是韩愈的观点很有影响；至于有人偏重李白或独重李白，则系沿袭白、韩之前的传统观点。宋代虽说是抑李扬杜极盛，却也有反潮流者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著名论家朱熹和严羽。“理学大师”朱熹谴责过李白从璘“没头脑至于如此！”<sup>(15)</sup>但主张“作诗先看李杜，如士人治本经”<sup>(16)</sup>，于李白不惟无贬辞，还认为“李太白诗非无法度，乃从容于法度之中，盖圣于诗者也”<sup>(17)</sup>，比较苏轼所谓“太白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”<sup>(18)</sup>，他的见解更高明一些；后世杨慎、屈大均称李白为“诗圣”，盖由此发明。严羽更是个对诗歌形象思维具有真知卓识的杰出论家，他标举盛唐、推崇李杜：“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，诗而入神，至矣尽矣，蔑以加矣；惟李杜得之，他人得之盖寡也。”<sup>(19)</sup>明确主张“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，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，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”<sup>(20)</sup>，并作过许多具体的分析比较，对明、清论家启发很大。惟其论诗独重艺术，于思想内容绝少涉及；这个弱点也影响了后世。金元之际李俊民、元好问，元季方回、赵孟頫、马祖常、宋无、范德机，明季宋濂、高启、李东阳，清季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郑曰奎、宋琬、魏裔介、缪曰芑等人，于李杜均

极推崇，无所优劣。值得介绍的是明代有几位重视唐诗研究的诗话作者，他们受严羽启发，主张李杜各有所长，未可轩轾。如著名论家王世贞云：“太白以气为主，以自然为宗，以俊逸高畅为贵；子美以意为主，以独造为宗，以奇拔沉雄为贵。”

(21) “五言律、七言歌行子美神矣，七言律圣矣；五七言绝太白神矣，七言歌行圣矣。”(22) “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。”(23) 同时另一位论家胡应麟云：

“才超一代者李也，体兼一代者杜也。李如星悬日揭，照耀太虚；杜若地负海涵，包罗万象。李唯超出一代，故高华莫并，色相难求；杜唯兼综一代，故利钝杂陈、巨细咸蓄。李才高气逸而调雄，杜体大思精而格浑。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，李也；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，杜也。”(24) 这些议论虽然局限于风格、体裁、技巧范围，绝少涉及思想内容，论点也并不完全中肯，但比起前人的笼统评价来，确实进了一步，对于我们了解李杜的各自特色有所启发。清代论家王士禛、沈德潜、袁枚诸人因各树一帜、另有标榜，于李杜议论不多。

除了以上所说抑李扬杜和李杜并重两派以外，历史上还有扬李抑杜一派。王世贞曰：“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，轻俊之士往往耳传。”(25) 以为扬李抑杜自杨慎始，不确。远在北宋初年，徐积在《李太白杂言》里便说：“盖自有诗人以来，我未尝见大泽深山、雪霜冰霰、晨霞夕霏、千变万化，雷轰电掣、花葩玉洁、清天白云、秋江晓月，有如此之人，如此之文！屈生何悴，宋玉何悲，贾生何戚，相如何疲；人生何用自缧縲，当须荦荦不可羁；乃知公是真英物，万叠秋山清耸骨！当时杜甫亦能诗，恰如老骥追霜鹘！”《四库目录》评徐：

“积好行艰苦卓绝之行，不甚合中道，其文奇谲姿肆、不主故常”，可见此公和李白有相通处。正因为“不甚合中道”，他的上述见解在北宋文人中并未引起注意。元代既没有抑李扬杜论，也没有扬李抑杜论，可是却有人于并重李杜中流露出对李的偏爱。清人宋荦《元诗选序》谓：“宋诗多沉僵，近少陵，元诗多轻扬，近太白”，多少有点道理。元季诗人当中，如刘秉忠、萨都刺、周权、宋褧、白珽、王恽诸人，便都对李白崇高评价而未及杜甫。这种倾向到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，刘基、张以宁、舒逊、詹同、徐贲、王彝、方孝孺、高棅、沈周、杨慎、陆深、王宠、宗臣、王叔承、王穉登、李贽以及杂剧作家邱濬、梁辰鱼等，便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重李白，并有人提出明确的扬李抑杜论。如果说宋代是抑李扬杜盛行的时代，明代便是扬李抑杜盛行的时代。不过，从下面的举例即可看出：明人的扬李抑杜不像宋人的抑李扬杜那样给人鲜明印象，原因是明人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宋人不同，不是重政治，而是重艺术，因此他们的抑杜便不可能像宋人的抑李那样达到诋毁程度。明初可以方孝孺的评价为例：“泰山高兮高可夷，沧海深兮深可涸，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，世人熟得窥其作？我言李白古无双，至今采石生辉光！”<sup>(26)</sup>也曾将杜甫与李白并提：“举世皆宗李杜诗，不知李杜又宗谁？”<sup>(27)</sup>仅此一例，他生平写过许多歌咏李白的诗文，对李白纵横豪放的天才和人格推崇备至，却未涉及杜甫，也未写过单独歌咏杜甫的诗文。明季中叶著名学者杨慎也是偏爱李白的人，尝称“李太白为古今诗圣”<sup>(28)</sup>、“公之诗泣鬼神、冠古今矣”<sup>(29)</sup>；于李杜优劣持论不一，一会儿说“韩退之曰‘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’

长’，信哉！”〔30〕此系并重；一会儿又说“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，此语亦太愦愦！”〔31〕则又主张李优杜劣。晚明李白崇拜者中可以王穉登为例，尝云：“予平生敬慕青莲，愿为执鞭而不可得！窃谓李能兼杜，杜不能兼李”〔32〕，他公开为李白从璘辩护，认为李白从璘比之杜甫流离秦陇、王维陷敌获免更要光明磊落；显然针对宋人诋李而发。和王穉登同时的杰出思想家李贽，在《李白诗题辞》中也曾充分表达过他对李白的特殊尊崇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也是抑杜伸李的代表，曾称颂李白曰：“千载人称诗圣好，风流长在少陵前”〔33〕；屈尝以屈原后代自诩，称颂李白也和他先人联系：“乐府篇篇是楚辞，湘累之后汝为师”〔34〕；又周在浚《送屈翁山返岭南》诗有“先生奇绝处，直似李青莲”句，注云“遇翁山如遇太白”，由此可见屈对李仰慕之情状。晚清龚自珍平生酷嗜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，于李白则云：“庄骚实二，不可以并，并之为心，自白始”〔35〕，其思想性格和作品均深受李白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白崇拜者中间做大官的很少，即如以上例举的几个代表人物，方孝孺和杨慎固然是有名的文臣，可并非掌权的显宦；王穉登是个国子监诸生；李贽只做过州佐县吏；屈大均终生不仕，并曾削发为僧；龚自珍则一生困阨下僚，暴卒书院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人大都身世不幸，并且有很强的反抗精神：方孝孺之尽忠建文不足称道，但他敢于反抗永乐，以至身殉，被夷十族。在封建士大夫中间应算是个有节概的人；杨慎以直谏犯上，远谪云南至死；李贽被目为“异端”，屡受迫害，死于狱中；屈大均入清不仕，大气凛然，并曾亲身参与反清起义；龚自珍冲破封建传统，积极要求

变革，不愧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先驱。

以上将历代李杜优劣论整理出一个梗概，首先是为澄清历史。近世论家每以元稹抑李扬杜论为“封建时代的定论”，实情远非如此，要错综复杂得多！对李杜优劣持论不一，一般说来，因时代而异，因人而异。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李杜持论不一，有助于我们了解李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差异；关于这种差异，本文后面将要进一步分析。不过，我们回顾李杜优劣争论的历史，主要兴趣不在争论本身，而在争论当中表现出来的一致性。

前人论李白，无论抑李扬李，均好用一个“奇”字，如“奇之又奇”（殷璠）、“才大语终奇”（钱起），“才矣奇矣”（白居易），“以奇文取称”（元稹）等等，又如皮曰休说他“言出天地外，思出鬼神表，读之则神驰八极，测之则心怀四溟”<sup>(36)</sup>，徐积说他“不知何物为形容，何物为心胸，何物为五脏，何物为喉咙”<sup>(37)</sup>，类似描写，在历代歌咏李白的诗文当中多得不胜枚举，均无不突出一个“奇”字。奇，不同凡响，首先是指他那出类拔萃的艺术天才。“天才”一辞在我国古代文艺批评中不多见，可是李白从唐代开始便享有天才的声誉。据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：“李白有天才纵逸之誉”。宋人叶廷珪《海录碎事》亦称：“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”；后世沿袭此说，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称“太白天才豪逸”，傅若金《清江集》称“太白天才放逸”，宋黎《太白酒楼》称李“天才气凌云”，方孝孺《吊李白》称“唯有李白天才夺造化”，高棅《唐诗品汇》称“李翰林天才纵逸”等。

等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国古人所谓“天才”，并非近代欧洲文艺批评中习用的那样只是一种空泛的评价，还包含着对作家才能的具体认识。徐而庵《说唐诗》云“吾于天才得李太白，于地才得杜子美”，王穉登《李翰林分体全集序》云“李盖天授，杜由人力”。其中固然不无褒贬，但主要用意还在说明李杜艺术才能的不同性质；这种不同性质，不妨用抑李扬杜的代表人物罗大经的话来解释：“李太白一斗百篇，援笔立成；杜子美改罢长吟，一字不苟”〔38〕。杜甫说李白“斗酒诗百篇”〔39〕、“敏捷诗千首”〔40〕，皮日休说李白“醉中草乐府，十幅笔一息”〔41〕，释贯休说李白“御宴千锺酒，蕃书一笔记成”〔42〕，王安石也承认“李白诗词迅快，无疏脱处”〔43〕，陆游也说他“饮似长鲸快吸川，思如渴骥勇奔泉”〔44〕，也都是称赞李白的才思敏捷。但不仅于此，杜甫还说他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〔45〕，皮日休还说他“言出天地外，思出鬼神表”〔46〕，释贯休还说他“仙笔驱造化”〔47〕，胡应麟也说他的作品“出鬼入神，惝恍莫测”〔48〕，可见前人称李白为“天才”，除了指他的才思敏捷外，还指他的作品具有力敌造化的艺术感染力量。这不仅是一种崇高评价，还包含着对他的艺术个性的认识。从杜甫开始，历代评价李白的人无不对他的非凡天才拍案叫绝，惊叹不已。即使是对李白贬抑至极的宋人，也还是说他“才高识卑”（据传这句话是王安石讲的，见元人祝尧编《古赋辨体》）才高，还是他们承认的（一般说来，宋人贬抑李白的思想，并不贬抑他的艺术）。我们所说的一致性，此其一也。

李白有个著名浑号：谪仙，是天宝初年进京时贺知章当面

奉送的，他自己也曾以此自称：“青莲居士谪仙人”<sup>(49)</sup>、“大隐金门是谪仙”<sup>(50)</sup>。这个浑号当他在世时便叫得很响，身后又伴随他的诗名千古流传，简直成了他的专用桂冠。“仙”已是奇了，前面又加个“谪”字，这就更奇！为此李东阳饶有风趣地问道：“纵有神仙亦妒才，不然岂谪来中土？”<sup>(51)</sup>李白还自称“狂人”，别人更是这样看他。中国文学史上称“狂”的诗人并不少，特别是盛唐时期，诗人都喜欢以“狂”自诩，连杜甫有时也未能免。可是，谁也不象李白那样经常地被人称道，如“不见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”<sup>(52)</sup>、“载酒五湖狂到死，只今天地不能藏”<sup>(53)</sup>、“笑傲玉堂金马中，诗酒猖狂天子客”<sup>(54)</sup>、“当年狂客心偏恋，近代风人谁与俦”<sup>(55)</sup>、“先生本非狂，古之天人也”<sup>(56)</sup>。“谪仙”和“狂”，都能够说明李白傲世独立和跌宕不羁的独特性格；这种性格和他既豪放又飘逸的创作风格又是完全一致的。“谪仙”的浑号突出一个“逸”字，“狂”则突出一个“豪”字。豪和逸，实在是历代论家对李白创作风格的一致定评！即使王安石也还称赞李白诗“豪放飘逸”<sup>(57)</sup>，李纲则称李白诗“豪迈清逸”<sup>(58)</sup>，都是肯定的评价。我们所说的一致性，此其二也。

李白颠沛流离的生平，同他的天才、性格和谐一致，亦颇富传奇色彩，引起过历代人的广泛兴趣。比如说，李白以诗著名召入翰林，这种事在历史上是空前的。司马相如因《子虚赋》受汉文帝征召，但那并非他的最初入仕，情形也远不如李白“神气”。唐玄宗接待李白是“降辇步迎”，“以七宝床赐食，御手调羹”。诸如此类的“荣遇”，在封建社会历代为人